

中共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整合— 兼論兩岸經濟整合

金國柱

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共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除從理論上作調整外，並引進市場機制，全力發展經濟。經過三十年，經濟發展成果已是全世界都不能忽視，而中共也逐漸將其國家安全政策，修訂為以發展經濟為主；由於中共在經濟實力不斷上升，「中國威脅論」也隨之發酵，因此，中共有必要對國際社會展現更為友好且負責任的姿態，而維護其周邊環境的穩定，並以經濟合作與經濟睦鄰的姿態開展其影響力，成為其經濟發展的首要工作。全球化的浪潮帶來了另一波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中心的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而台灣應如何此一區域整合的趨勢，則有賴當政者的深謀遠擘。本文嘗試從區域整合的相關理論探索亞太區域整合的理論基礎，進而探討中共經濟發展與亞太區域整合的關係，以及台灣在此區域整合的前景。

關鍵字：區域經濟整合、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兩岸關係、亞太區域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Across Taiwan-Strait

Kuo-Chu King

PhD candidate of Polit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1978, China has based its reform on the “One Core, Two Basic Points”--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the core, holding on the four principles, and hold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 policy-- route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hina has not only adapted the theories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but also introduced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develop comprehensively the economy.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success of th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not be ignored by the whole world, and China has changed it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mainly towa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its economic power rising continually, “China Threat Theory” is also rising. Therefore, China has to show more of its kindness 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eeping the stability in its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nd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with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good-neighborliness that will be its first priority.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leads to another wave of Asia-Pacific regional integr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China market. Taiwan must depend on the deliberated planning if it wants to cope with this trend.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i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sia-Pacific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aiwan's prospective in the integration.

Key words : Regional Integrat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Across Taiwan Strait, Asia-Pacific Region

一、前言

區域經濟整合並不是個新名詞，歐洲國家早在五〇年代就已實際推行過。隨著東西兩大集團軍事對抗的結束、知識的快速流通、科技的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區域經濟整合已蔚為趨勢，過去以國家為單位單打獨鬥的貿易發展策略顯然行不通，唯有透過更積極的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才能強化個別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以及確保國家經濟利益。中共經濟改革三十年，也正逐步走向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大趨勢之中。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共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除從理論上作調整外，並引進市場機制，全力發展經濟。經過三十年，經濟發展成果已是全世界都不能忽視，而中共也逐漸將其國家安全政策，修訂為以發展經濟為主；由於中共在經濟實力不斷上升，「中國威脅論」也隨之發酵，因此，中共有必要對國際社會展現更為友好且負責任的姿態，而維護其周邊環境的穩定，並以經濟合作與經濟睦鄰的姿態開展其影響力，成為其經濟發展的首要工作。特別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勢力擴大至中亞、南亞，加上在西太平洋以美日安保為核心的防禦島鍊，使中共在面對隱然成形的三面限縮之勢下，向外尋求突破；自然地，與東協國家發展關係，就成為政經戰略上的一個必然選擇。這種發展結合了全球化的浪潮，帶來了另一波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中心的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而台灣應如何此一區域整合的趨勢，則有賴當政者的深謀遠擘。本文嘗試從區域整合的相關理論探索亞太區域整合的理論基礎，進而探討中共經濟發展與亞太區域整合的關係，以及台灣在此區域整合的前景。

二、區域經濟整合相關理論與發展

（一）緣起與發展

一九五〇年代起，全球政經局勢起了重要的變化，其中最顯著的改變正是區域經濟整合。¹這一發展有幾個主要原因：首先是歐洲的整合運動效應。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場都是在歐洲，因此二次戰後，歐洲人苦思和平之道，他們

¹ 「整合」是在互動的過程（ process ）與可能發展（ possible developments ）中，以協商或協議為工具來達到某些共識，並且在此一共識下承認並接受個體成員的個別性存在；其有別於「統一（ unification ）」或「合作（ cooperation ）」，後者無法將「整合」一詞中所涵概的「互動」特性以及「發展趨勢」特性清楚表達。

發現民族主義和經濟利益衝突，是戰爭的主要禍源，為了建立永久和平，並迅速在戰後廢墟中重建站起，歐洲部分國家決定推動區域整合，而這股力量後來慢慢延伸到其他地區。歐洲整合運動，後來引起其他國家群起效應。除了歐洲整合運動的示範性效應外，另一個帶動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原因是冷戰結束。在此之前，區域經濟整合多半是第三世紀國家或邊陲國家的經濟結盟，如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區、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等，一九九〇年蘇聯和東歐共產集團瓦解之後，東西兩大集團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對抗也就成為歷史，經濟成為主導世界資源分配的主要力量，世界經貿版圖面臨重整，使得透過結盟來從事經濟改革的構想逐漸形成，但受制於地緣及歷史背景，因使區域性經濟整合蔚為潮流（張維邦，1995：61-75）。近半個世紀以來全世界最重要的發展趨勢—全球化（何振生，2001：43-48；徐偉傑，2000：11-12；李英明，2001：93-96；沈宗瑞，2001：21），²也同時深深影響此一發展。

全球化是一個高度複雜，彼此獨立，卻又相互依賴的過程，使得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融為一體，並且因為國家之間的依存與互動，全球已經逐漸演變成一個單一運作單位。就經濟意義而言，全球化意味著對經濟資源進行全球範圍的配置，使經濟資源不受國家疆界的限制自由移動，發揮最高效益。全球化已經成為全世界發展主流，但整合要能順利運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於開發中國家實施而言，經常會因為成員國彼此之間經濟發展水準差距過大，造成協調方面困難，甚至成員國之間因為產業結構差異，為保護本身利益，而抵制整合方案的推行。此外，政治因素也是重要的障礙因素。在開發中國家，經常會因為成員國對於主權的堅持，或國內不同勢力的利害無法取得一致，內部支持程度不夠，甚至或因為成員國政治和社會情勢不穩定等原因，導致經濟整合無法順利推行，中共和臺灣也是如此。中共的經濟目前還在發展中階段，雖然具備雄厚的市場潛力，同時也是全球這幾年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之一，但在全球化架構下，仍然會受到全球化的衝擊，其經濟發展必然會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區域經濟整合將迫使國內市場完全開放，國內競爭力較弱的產業將很難不受

² 全球化一詞最早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安吉爾（N. Angell）在一九一〇提出，而全球化的系統研究則始於八〇年代；九〇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以及冷戰的結束而達到最高點。目前全球化定義仍莫衷一是，政治學家認為全球化是傳統定義中，「國家」弱化的現象，經濟學家則強調全球化是邁向全球市場整合的步驟和過程，但這些說法都無法充分涵蓋全球化的內容。由於研究者的立場與觀點各異，故在名詞界定上較難以整合，簡單而言，係指「世界被迅速塑造成一個共同的社會空間」。至於比較周延的定義則是「包括各種社會關係與處置措施等空間性組織的轉變，而產生跨越洲際或跨越區域的行為，互動與權力運作等交流網絡的一系列過程」。其有以下特徵：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經濟取代軍事、軍隊角色弱化、政府控制能力消退、非政府行為者重要性提升、國際組織重要性增加。

到其他加盟國同樣產業或產品的威脅。一旦整合程度加深，加盟國將可能喪失經濟的自主權，無法使用關稅，貿易障礙，來保護國內的產業和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惡性的區域經濟競爭，可能會興起貿易保護主義的潮流，不利全球市場的運作。然而，拋開政治結構、社會情勢等因素，區域經濟整合仍有其促進經濟成長、提高整體的競爭力、貿易創造效果、³貿易轉移效果、⁴興起貿易保護主義等利基（朱景鵬，1999：12-14），在今日全球化經濟整合和區域集團化的發展下，將是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

（二）概念與相關理論

快速的經濟與科技發展是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兩項重要特質，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便隨著經濟與科技的加速發展而日益緊密；隨之，從事此類「國與國間關係發展的過程以及可能帶來的結果」之研究，便逐漸發展成一套經濟整合論（integration theory），或者是區域經濟學。依 W.H. Miernyk 之定義，「區域科學」（regional science）或「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是社會、經濟、政治及行為等現象中，含有空間概念者之研究的科學。而區域科學中，以經濟觀點研究的部分即為「區域經濟學」。區域經濟學是以經濟學觀點來研究：在資源分配不均又無法完全自由移動的世界中，各個地區之差異，及地區間關係之科學。因此，區域經濟學是一門具備科際整合特性的學科。另就區域經濟研究的對象而言，「區域經濟」涵括兩個範疇的研究：一是，針對單一國家內部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問題，尋求縮小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的策略研究；例如，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地區經濟計劃等。二是，超越國家地理概念的區域經濟整合；例如：東南亞國協東部成長區（EAGA）、世界三大區域經濟組織等。⁵ 本文所論及者，除探討中共國內面臨的問題外，並就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及中共的角色作一分析。

由於區域經濟整合論缺乏一套嚴謹的、經過整合的理論體系，在發展過程中，便逐漸形成各個流派：關稅同盟論、功能主義論（Functionalism）、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溝通學派（Communication School）、聯邦主義（Federalism）等。區域經濟整合的研究介於國家與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方向。關稅同盟論、飛雁模型以經貿、投資與生產分析為主，偏向於經濟面。馬克思主義、聯邦論、政府合作論與理性選擇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涵蓋政治與經濟面；聯邦論與政府合作論介於宏觀與微觀之間，並針對歐洲整合的脈絡研析；理性選擇論擅長於細部

³ 貿易創造效果，指生產效率高的加盟國取代了生產效率低的加盟國的生產，在生產資源效率提高後所可節省的機會成本。

⁴ 貿易轉移效果，係指生產成本高的加盟國取代了生產成本低的非加盟國的生產，導致資源使用的扭曲。

⁵ 引自「區域經濟發展趨勢與亞太前景」一網址為 <http://mail.tku.edu.tw/tengyy/research/chap14.htm>

的、具體的、個案分析的政策分析，沒有具體的政治或經濟傾向。關稅同盟理論偏向於區域的經貿結構問題。新功能主義則是聚焦於國家之間互動後的制度運作與過程。政府合作論與功能主義涵蓋國際經貿組織的建立與運作。馬克思主義著重整體的觀察指出歐洲整合與資本主義演變發展之間的關係，強調歐洲的整合是透過區域分工，解決國家發展面臨的內外挑戰與問題。飛雁模型則是指出東南亞的區域整合是在區域分工的策略與行動下，形成非正式的區域整合。政府合作論與聯邦論則將焦點集中在國家機關，探討各國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

各種理論所著重的面向不同，研究取向亦因之而有所不同，完全取決於理論的切入面向及建構方式；另外，因地理環境、歷史背景及國家利益（立國原則）的狀況有所不同，所牽涉的政治層面也較為複雜，因此不在本文所討論之範圍內。有關各種整合理論比較如表一：

表一：整合理論一覽表

特性 理論類別	經濟 層面	政治 層面	以國家 為主體	建構超 國家組織	整合過程	代表人物
關稅同盟論	✓		✓	✓	政府間協商	Jacob Viner Bela Balassa
功能主義	✓			✓	從經濟與社會領域 合作逐漸擴大合作 範圍	David Mitrany
新功能主義	✓	✓	✓	✓	經濟整合易於走向 政治整合	Ernst B. Haas Philippe Schmitter Leon Lindberg Joseph S. Nye Jr.
馬克思主義	✓	✓	✓	✓	政治整合建立的超 國家組織等於國家 機關的翻版	Karl Marx
飛雁模型	✓				純粹分析經貿與投 資的區域化發展	Akamatsu Kaname
聯邦主義	✓	✓		✓	從政治著手經由制 度建立超國家的憲 政體制	Jean Monnet Robert Schuman Paul-Henri Spark Altiero Spinelli
理性選擇論					以精緻的模型分析 做為決策的參考	George Homans James Buchanan
政府合作論	✓	✓	✓		政府間的協商機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王佳煌(1998:231-266)。

（三）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

如前所述，隨著全球化經濟整合和區域集團化的發展趨勢，過去以國家為單位單打獨鬥的貿易發展策略顯然行不通，唯有透過更積極的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才能強化個別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以及確保國家經濟利益（宋鎮照，2001），區域整合便成為當前及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目前世界三大區域整合體分別為：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以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APEC）。三者中，以 EU 的整合歷時最久，整合的程度亦最成熟，不僅已達人員、商品、勞務、資本自由移動的「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目標，更完成區域法定貨幣—歐元（EUR）的啟用。隨著歐盟與北美相繼形成經濟塊狀後，產生了經濟板塊擠壓的影響，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經濟的整合已經是結構上的需要與必要。

亞太地區的整合構想雖源自一九六十年代日本所提出的太平洋盆地經濟合作，但自 APEC 成立以來，強調以亞洲瀕臨太平洋國家為主要經貿合作關係的「亞洲主義」，與主張「亞洲—太平洋」區域經貿關係的「亞太主義」路線之爭，一直是亞太區域整合的障礙，尤其是亞洲瀕臨太平洋區域，仍有處於極端對抗的政治局勢，使得區域整合似乎無法推展；然而，在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下，區域貿易已經成為目前亞太地區經濟增長的最重動力來源，同時為了吸引外國投資、增強企業競爭力及地緣政治的考量，各國莫不積極推動區域經濟整合。例如，中共與東協在二〇〇二年簽訂「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日本與新加坡簽署自由協定，同時提出建立「日本—東協自由貿易區」及「亞洲自由貿易區」等構想；而「經濟共同體」、「大中華經濟圈」、「共同市場」、「華南經濟圈」以及「自由貿易區」等兩岸經濟合作議題亦多有討論，其目地不外乎是希望藉由兩岸，包含香港和澳門的經濟整合，擴大經濟利益，進而尋求政治關係的改善。然中共對臺灣主權的堅持，加上臺灣內部持續存在的統獨爭議與國家認同問題，兩岸經濟整合有其現實上的困難，但在全球化經濟整合的下，仍不離此一發展的趨勢。

三、中共經濟發展與亞太區域經濟

（一）中共的經濟改革與理論調適

大陸從五〇年代建政初期「五年經濟計畫」，隨後的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直到一九七八年鄧小平上台，力行經濟改革，引進市場經濟，大陸經濟才有所起色。到了八〇年代末期，積極開放市場。今天的大陸已成為國際經濟社會的一環，而且在全球的經濟影響力舉足輕重。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掌握政權，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呼籲改革傳統計畫經濟，引進市場經濟體制，中共經濟發展進入「引進市場觀念階段」。鄧小平認為，唯有推動農業自由化和引進私有經濟誘因，才能使中國免於經濟崩潰。一九七九年起，推行「對內搞活，對外開放」之外向型發展政策，主要措施為：降低重工業投資比重，提高輕工業及農業比重；放棄「自力更生」的關門主義，改採取開放政策，以吸引外資及技術；效仿臺灣採取貿易導向政策，全力擴大對外輸出；在農村實施「包產到戶」，放棄「人民公社」，以及在城市恢復個體經濟及私營企業。顯然地，鄧小平想發揮大陸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之優勢，發展勞動或資源比較密集的產業，因為其相對成本較低，具有競爭力，易於累積資金，之後再移轉資金至較密集的產業（鄭竹園，1991：8-9）。

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為一封閉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自給自足，貿易參與率不高。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繫日益密切，大陸的貿易依存度漸漸提高，透過擴展對外貿易、引進先進技術、吸引外資、以及發展國際技術合作，使傳統工業的技術進步，高科技產業得到一定的發展。此外，改革開放後，大陸產業結構調整，扭轉了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比例失衡的局面，城市的產業、技術、及人才拓展到農村，也使許多鄉鎮企業的產量和技術提升不少（林炳文，1996：39-45）。

鄧小平統治期間，經濟改革並非一帆風順，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也經常質疑鄧的路線，但基本上中共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未曾有所改變。一九八四—一九八八年趙紫陽主政時代，由於思想開放，創造了五年經濟快速成長的成績，但在一九八八年六四事件之後，由於政治不安，社會治安惡化及投資意願大幅衰退，保守派的勢力又佔上風，中共經濟進行為期三年的治理整頓，採取「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的緊縮政策，以抑制日益惡化之通貨膨脹。

一九九二年春節前後鄧小平南巡，再次掀起經濟改革的高峰，期間鄧小平稱「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不改革就下臺」、「要防左」、「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經濟，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等，隨後中共十四大會上，確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路線。無疑地，鄧小平這番行動，再次確立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沒有回頭路的基本路線，大陸經濟發展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

一九九六年鄧小平逝世，江澤民上台後，為了強化作為鄧小平接班人的合法性和領導基礎，繼續深化改革路線，經濟發展也獲致良好的成果，即使一九九七年，大陸遭逢亞洲金融風暴傷害，對外貿易轉壞，但中共以擴大內需的方式來挽救經濟惡化，成果顯著，隨後幾年的經濟成長率，都在7%以上。即使在二〇〇三年面臨全球經濟蕭條，SARS 疫情威脅的情況，以及加入世貿組織的調整時期，

仍舊維持了其經濟成長（Overholt,2004:48）。

經過近二十幾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但其主要表現在中共中央權力下放與對外開放兩方面，在意識形態上卻仍堅持社會主義路線，所有體制仍然強調以公有制為主，在經濟政策上則是採行市場經濟的做法，以尋求經濟發展，此即鄧所謂的「修正的社會主義路線」或「中國的社會主義」。這樣的改變，使得中國經濟在所有制結構方面，由單一的公有制，朝向以公有制和市場經濟並存的所有制結構轉變。在企業機制方面，國營企業開始由政府的附屬物，同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轉變。在市場機制方面，改革前市場範圍限於一部份的消費品，改革後逐漸擴大到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在政府對經濟的管理上，開始由直接的行政命令轉向以經濟為主的間接調控。在內外經濟交流方面，開始由封閉、半封閉的經濟轉向開放型的經濟（鄭竹園，1994：97-166）。

（二）現況與潛存問題：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採取改革開放以來，已逐漸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轉向市場經濟，不過市場管制與人治色彩仍然濃厚。隨著全球化的潮流，逐漸和國際社會接軌，將使得大陸經濟更加開放，經濟體制也將更制度化和透明化，同時也對全球釋放出 13 億人口的商機，加大全球資金的磁吸作用。隨著外國企業投資不斷擴大，不僅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減緩社會因為這些年國有企業改革大規模的下崗，失業人口所造成之社會壓力，同時亦加速農業生產勞動力轉變工業生產勞動力的速率，提升整體國民所得，進而擴大國內需求，擴大經濟規模。

此外，中共以市場換取技術，透過與外商在經貿、技術上之合作，積極發展電子資訊、軟體、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產業，並強調以企業為主體之研發聯盟的建立，加上致力提高服務業、製造業的競爭力，都提升大陸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在亞洲經貿影響力。但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國際社會中經濟權力勢將產生再分配，上述現象可能一如冷戰時期或冷戰後之政治權力再分配如出一轍，在未來的經濟權力的重組過程中，中共本身是否可以從中取得關鍵性的優勢，乃長期困擾中共政權的癥結所在（楊雪冬，2001：259-262）。

雖然中共已經走在市場經濟道路上，但其在全球化過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與定位，可能未必如其所預期一樣樂觀（宋國誠，2002：1-25）。「市場」，產業結構改變的幕後推手，政府干涉應減至最低，並為產業轉變提供穩定的環境。一如前述，中共經濟運作體制一直是中央集權，統合運用及支配資源，以快速達成其工業化的目標，而非完全以市場為導向，再加上中共官僚體系對資源的無效分配，扭曲了產業的發展，使得傳統工業與農業、城市及鄉村間產生了藩籬，進一步加深此二元經濟之間的衝突（Chen, 2001:37）。這樣的衝突引發中共經濟發展

的問題如後：

1. 農業部門基礎薄弱，勞動生產力偏低：大陸農業人口高達總人口之 50% 以上，但因為經濟高速成長後，耕地減少、土壤退化以及長期投資嚴重不足，農業經營規模不大，因此經濟效益不高。復以加入世貿組織後，迫使農村失去二千萬個工作機會，官方承認農村失業是一「主要問題」，且稱農村剩餘勞動力高達一億六千萬人，大批農民破產或無事可做，在城市邊緣形成貧民窟，勢必容易引發社會問題（中國時報，2002/2/28）。為解決這項問題，中共應加強農業，包括：增加農民收入和保持農村穩定方面，如此中共將需要加強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並提高農作物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同時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調整和農村、產品結構，廣泛開闢農村就業空間，推進農村產業化經營。

2. 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中共改革開放從沿海地區開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迅速，近幾年來平均成長率都在 20%-30% 間，而內陸地區成長率則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林炳文，1996：39-45）。此一現象使得中共區域間經濟差距日益擴大，同時產生省城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並弱化中央對地方控制，不利於整體經濟發展，秩序和效率的維持。雖然一九九五年起，中共開始實施所謂的「九五計畫」，調整昔日經濟資源向東傾斜的現象，鼓勵外商對內陸地區投資，逐漸將資源導向中、西部地區，以達到經濟平衡發展的目的，但成果仍然有限，多數資源依舊掌握在沿海地區和大都市，內陸和沿邊地區的開發則需要再加強。

3. 金融體系弊病叢生：根據亞洲政策論壇指出，一九八三年起大陸財政部門即不再挹注國有企業，而改由銀行支應國有企業之需，由於大陸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占金融總資產的 70% 以上，而四大銀行對國有企業的貸款占貸款總額的比例高達 80%，因此國有企業普遍性的經營不善即是形成銀行不良貸款的主要因素，「合理的估計」，中共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占其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40%，遠比日本的 10% 要高得許多，巨額的壞帳不但使得大陸信用緊縮，減緩經濟成長，而且有可能導致大陸金融秩序全面崩潰，影響社會安定，危害中共經濟改革成果（經濟日報，2002/10/2）。關於金融體系問題，中共應積極整頓不良放款，同時透過金檢和證券法規提高銀行業務的透明度，同時開放外商和民營銀行經營，透過市場機制刺激公營銀行提升自身競爭力，從根本進行金融改革。對於日漸興起的股市違約交割和內線交易等金融犯罪，也應積極查察，杜絕不法，以免影響金融市場的安定。

4. 中共市場為外資控股和技術壟斷：近二十年來積極提供給予比當地企業更優惠的措施吸引外資，但長期下來不僅壓抑當地企業的發展，更讓當地企業喪失國內市場的競爭能力。外商投資除了數量增加外，在投資形式上從新建轉向併購，特別是有選擇的、重點式的對某些行業和某些地區國有企業進行規模性併購，從

參股外銷到控股控市，從資金輸入到品牌輸入，從合資到獨資經營，而在投資項目上則轉向大規模、系統化投資，轉向佔領大陸市場。例如，在機電、通訊設備方面，外資所佔的比重更高；摩托羅拉（Motorola）就佔了大陸手機市場的90%。

全球化並非是一個靜止概念，而是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經濟全球化更是無可迴避的歷史趨勢。中共自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國內所有企業幾乎皆已面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快之形勢，無庸置疑地，中國已經徹底走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市場競爭促進商品質量的提高與價格合理化，外資大量湧入則促使中共經濟整體的發展速度加快，且能開闢更多的就業途徑，進而能有效提高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馬立誠，1998：216-217）。除了上述問題外，還有許多問題尚待克服，包括不斷攀升的失業率、國營企業經營績效不彰、通貨膨脹、以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等；而中共當局也知道這些工作不是一蹴可成，必須透由破除了國有企業「有飯大家吃」的心態，鼓勵外商赴陸加入競爭行列，改造國有企業體質，並且體認要未來長遠的發展，必須發展優質的高科技能力、改善金融體系、革新行政及司法系統等，並由發展科學及教育著手，才能逐步實現（Chen, 2001:41-44）。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早在八年前就曾提醒中共必須建立一套足以讓人信任的法律系統，以及有效率的金融體系（轉引鄧嘉玲，1998：32-33）。中共非常清楚，若一味地反對全球化終將可能是沒有出路，且終究必須接受全球化思維，參照部分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理念，諸如法律制度與司法獨立，以正當手段確保原料來源，運用低價勞力，強化產業分工，以及消除貿易障礙等，始能有效降低全球化的衝擊，進而實施漸進式的政治變革，進一步融入全球化體系。

（三）未來發展趨勢

1. 經濟睦鄰，持續成長

隨著全球化經濟整合和區域集團化的發展趨勢，過去以國家為單位單打獨鬥的貿易發展策略顯然行不通，唯有透過更積極的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才能強化個別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以及確保國家經濟利益，這便是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亞太經合會等制度化區域組織所欲追求的經濟優勢。對此，東亞國家對於東亞經濟圈的理念，給予高度的重視。在東亞區域主義抬頭下，加上金融風暴危機激起的亞洲主義新意識，東亞國家積極尋求財經合作（宋鎮照，2001）。

就東亞地區而言，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日本、中共，就扮演關鍵的角色。首先，東協國家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來經濟發展迅速，成為世界公認的經濟增長速度最快地區之一，其年平均成長7.5%遠高於世界其他地區經濟成長率。九〇年代後，面對經濟發展區域化，東協進一步強化區域內經濟合作，一九九二年十月，東協制定了15年內建立「東

協自由貿易區」，並提出將關稅降至 5% 以下的長遠目標。九五年十二月東協再次決定加速經濟整合進程，將實現自由貿易區時間縮短五年提前至二〇〇三年，合作領域也從貿易擴展至金融、投資、服務業、知識產權領域等，並計畫於二〇一〇年建立投資區，二〇二〇年實現投資自由化。

另一個區域經濟超強—日本，一方面受到國內農業問題的牽絆，另一方面也受創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以來的泡沫經濟，而忽略了繼續發展與周邊國家作經貿制度整合的重要性，直到中共與東南亞之加強政經結盟，才改變原本面對區域主義躊躇不前的態度。除了與東協的個別國家洽商雙方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之外，東協加三（東協十國與日本、中共、南韓）的「自由貿易區（FTA）」構想也被提出。此外，日本與東協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11-12 日）在東京舉行的日本與東協建立夥伴關係三十週年紀念高峰會上，共同發表「東京宣言」，揭示日本將與東協共同致力推動「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提升彼此經貿、政治與安全等領域的合作關係，並謀求在二〇一二年底完成日本與東協的 FTA（吳榮義，2004）。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開始，「自由貿易協定」（AFTA）的簽訂是本區域經濟結盟的重心所在。已經完成簽署的比如：東協自由貿易區、日本與新加坡的新世紀自貿協定，以及中共與香港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等。其他緊密程度更高的型態，包括關稅同盟、經濟共同市場，以及經濟同盟等建議也陸續出爐。尤其自一九九七至九八年東亞金融危機以來，「東協加三」（日中韓）與「東協加一」（日、中、韓個別）的對話機制⁶ 已成為東亞區域整合的觸媒（東協代表東南亞，日中韓則是東北亞），或名符其實的東亞論壇，而「東亞共同體」此一概念的提出（相關討論如表二），則與這兩條整合線路密切相關（詹滿容，2003）。

二〇〇二年在金邊所舉辦的第六屆「東協加三」高峰會議共同聲明中，就提出了「東協加三」的「東亞共同體」之合作內容，聲明中除了包含經濟與金融合作外，尚擴及政治、安全、環境、能源、文化教育，以及諸多社會舉措，嘗試將「東協加三」高峰會議由目前的「對話機制」邁向「建制化」階段（宋鎮照，2001）。此外，二〇〇三年十月八日東協高峰會時，亦發表了「第二次峇里島協和宣言」，期建立政治安保、經濟、社會文化等三方面建立新共同體，並於二〇二〇年前邁向「經濟整合」，成立歐洲式經濟共同體、縮小社經差距、倡議建立安保共同體、

⁶ 「東協+3」（ASEAN plus Three, APT；東協十國與日本、中國與韓國三國每年召開領袖會議）與「東協+1」（在上述會議期間，由東協十國與日本、中國、韓國或其他國家個別召開領袖會議）。除此以外，尚有部長會議（目前已有財長會議、外交部長會議和經濟部長會議），以及資深官員會議。

共享和平民主。

表二：東亞共同體概念

有關 community 之概念	倡議時間	倡議者	成員	結果
Pacific Asia Free Trade, PAFTA	1965	小島清 粟本弘	日本與環太平洋國家的已開發國家（美、加、澳、紐）	美國反對，日本改而倡議太平洋貿易與發展組織（OPTAD），此為PECC前身。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1993	美國主導之 APEC「名人小組」提出	APEC成員	1993年APEC西雅圖會議否決。 （因當時東亞國家對「亞太主義式」的區域整合有疑慮）
EAEG (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1990.12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	東協、日、中、韓、台、港(排除美加澳紐等白人國家)	美國反對(日本擔憂EAEG的成立會影響美日貿易關係，故反對)。該倡議在次年改成非正式論壇的EAEC
EAEC (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1991	東協	東協、中國、日本、南韓	美國反對(停止運作)
East Asia Community	2002	「東協加三」對話機制	● 東協加三高峰會上的共同聲明內容	發展中
East Asia community	2003	日本、東協(東京「日本與東協三十週年紀念高峰會」)	東協、日(共同推動東亞共同體，並謀求2012年完成東協加日本的FTA)	發展中

資料來源：台經院，轉引自吳榮義，「東亞共同體」之倡議與展望—兼談台灣因應之道（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九十二年度國際事務檢討會，民國93年2月19日）。

2.東亞區域整合的新興角色：中共

中共的經濟發展快速已是事實，但中共與東協的關係僅能溯及一九九一年七月，前外交部長錢其琛應馬來西亞之邀參加東協部長會議開幕式時，表達了願意與東協開展各方面合作的意願。東協當時對中共的意願作出相當正面的反應，於是開始就雙方關係進行一連串的協商。一九九三年，東協秘書長艾吉特辛率團赴

北京與當時的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唐家璇會談，確定成立經濟貿易合作、科學技術合作兩個聯合委員會，這是中共正式與東協建立關係的濫觴。一九九六年七月，「東協」部長會議正式接納中國成為正式「對話夥伴」，當時的中共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率團與會，第一次正式參加東協會議。二〇〇一年，在九一一事件與東亞政經局勢的變化（金融風暴、SARS 等）等影響，以及中共加入 WTO 的因素下，使得中共在面對東亞的區域整合風潮下，更有施力點去拓展其區域政經影響力。

二〇〇一年二月廿七日，中共標榜著「亞洲人談亞洲事」的旗幟，主導成立「亞洲博覽論壇」，目標就是在協助亞洲國家拓展其經濟利益，並要在區域經貿事務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二〇〇二年，中共與東協簽署「中共—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議」，⁷ 並預計將在二〇一〇年以前建立「自由貿易區」；二〇〇三年之後，東協與中共強化彼此政經合作的態勢更是明朗。在印尼峇里島舉辦的東協—中共例行高峰會議上，中共總理溫家寶呼應了「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亞洲華爾街日報，2003/10/12-13），雙方亦簽署了包括「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⁸「東協—中共之和平與繁榮戰略夥伴關係宣言」，⁹以及「東協—中共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之補充議定書」¹⁰ 等三份文件，其中「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是「東協」國家首度與非區域國家簽訂，在實質的意義上，中共等於已經變成「東協」的「第十一國」，在「東協」國家中的份量可見一斑。

當二〇〇一年時，全球各研究機構研判世界經濟會在第四季逐漸復甦，因此東協希望與中共、日本和南韓同時保持固定的經貿關係，在態度上對於形成自由貿易區之構想並不積極支持。尤其當九一一事件對全球經濟產生嚴重的負面打擊，各預測機構紛紛調降對全球和主要經濟體之經濟成長預期和延後經濟復甦時點至二〇〇二年下半年，在短期經濟復甦無望的情況下，為了穩定東協各國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在中（共）美關係穩定（反恐的共同利益與在北韓問題上的合作）的狀況下，有更大的自由度來選擇政經結盟的對象，於是考慮與經濟成長較快且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中共大陸進行經濟整合，中共也利用了此波區域主

⁷ 「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的功能在於設定整體目標、擬定實現 FTA 的時間表、預設涵蓋部門的範圍、確立關稅減讓的原則，以及提出「提前收割計劃」（Early Harvest Programme, EHP）。所謂「提前收割」指的是，雙方在正式締結 FTA 之前，即先針對某些產品項目進行關稅減免。

⁸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http://www.aseansec.org/15268.htm>

⁹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http://www.aseansec.org/15265.htm>

¹⁰ Protocol to Amend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aseansec.org/15157.htm>

義風潮，積極與周邊國家洽簽 FTA，既對國際投資者產生正面的誘因，也符合了東協的希望。

依據日本新聞社委託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所進行之「二〇二〇年亞洲產業競爭力」研究報告指出，如果受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亞洲金融風暴衝擊之亞洲地區金融體系可以重建完成，日本、臺灣、中共、南韓、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等東亞九個經濟體在二〇二〇年前之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將達 5% 左右，而電子電機產業將是帶動該地區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此外，在一九九七年世界銀行所出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一九九五至二〇〇〇年中共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將達 8.6%，而因人口、資本累積等因素影響逐年降低，在二〇二〇年時到達 5% 左右。同年，亞洲發展銀行亦在其出版的「新興的亞洲：機會與挑戰」一書中，舉出中共三種可能的經濟發展趨勢，無論其提及的看法為樂觀或悲觀，一直到二〇二五年，中共的 GDP 皆為亞洲之冠（Chen, 2001:108-113）。

不論旁觀者對中共未來的經濟發展抱持樂觀或是悲觀態度，¹¹ 中共已注意到其所面臨的未來經濟挑戰，除了內在問題外，加入國際金融及貿易體系後隨之而來的競爭，更是不可忽視。雖然中共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時，國內、外的批評不斷，但卻無任一國家指責中共忽視其應負的相關義務（Overholt, 2004:48）；由於中共在經濟實力不斷上升，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其急速上揚的國力與因此而產生的磁吸效應，這使得中國有必要對國際社會展現更為友好且負責任的姿態，而改以經濟合作與經濟睦鄰的姿態變相開展其影響力。東協與中共的人口總和有十七億，預估未來十年將增加到二十億人口，這個自由貿易區除了潛在市場規模受到重視，目前的經濟規模也十分可觀。特別是在九一一之後，隨著美國勢力的不斷擴大，在中亞地區美俄聯手合作反恐，在南亞次大陸美印關係改善加溫，在西太平洋以美日安保為核心的防禦島鍊，適遏制中國東出向海權擴張。在面對隱隱然成形的三面限縮之勢下，中共向外尋求突破，自然

¹¹ 未來中國可能的發展途徑：一是，樂觀的大中華世紀論。Ian Morrison 在其《第二曲線》一書中指出，新興市場是的主角，而包括中國、印度、印尼、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等國家，在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發展中呈現了三項特性：龐大的消費市場、投入全球市場競爭追求成長、產生貿易順差並累積外匯存底。而第三世界新興市場因其消費潛力成為企業在全球競爭的必爭之地，外資的投入除了加速資本累積，更帶來技術轉移，未來這些國家將因而掌握全球經濟的主導力，為企業在全球競爭中創造第二條的成長曲線（The Second Sigmoid Curve），因此，上述第三世界具市場發展潛力的國家遂被稱為第二曲線國家。

二是，悲觀的中國質疑論。東亞經濟發展的模式自八〇年代中即名噪一時，但在近十多年來，中國及東南亞各國高經濟成長的背後卻潛藏著投資過熱、各項經濟制度不健全的隱憂。中共自對外改革開放以來因社會經濟二元化、區域不平衡發展所呈現的弔詭現象等，都將成為未來社會政治動盪的誘因，進而阻礙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引自「區域經濟發展趨勢與亞太前景」—詳見 <http://mail.tku.edu.tw/tengyy/research/chap14.htm>

地，與東協國家發展關係，就成為政經戰略上的一個必然選擇（聯合報，2002/11/5）。

總言之，東亞地區未來如能在經濟上完成整合，並以市場為導向，建立完善的金融體系及適宜企業競爭的環境，將有助於區域內經濟之成長；而「東協加三」如整合成功，將與北美自由貿易區與歐洲聯盟鼎足而立，成為全球最重要之三個塊狀經濟體，其效應將影響全球之經濟事務，並將進一步帶動全球政治版圖之重整。現今儘管中共面臨某些內部壓力，但卻已經日漸被視為亞洲經濟成長與發展的火車頭，在亞洲的經濟整合中扮演要角，¹² 正如同國際經濟影響中共的經濟一般，中共的經濟也影響著國際經濟；中共經濟轉型成功與否，與國際經濟息息相關，倘中共不能成功轉型，則世界經濟的重建也將受到阻礙（Chen, 2001:44）。

四、台灣在區域整合趨勢的前景

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發展趨勢來看，區域整合間之成員國藉由整合、協調經濟稟賦差異，發展專業分工，使成員國在經濟、貿易、投資等方面，獲得更大的利益，已經成為一股潮流。隨著臺灣和大陸經貿關係不斷成長，相互依賴程度與日俱增，不但為兩岸經貿整合提供良好基礎，經濟整合的呼聲持續不斷，各種整合構想，例如：「大中華經濟圈」、「自由貿易區」、「共同市場」和「中華聯盟」先後引起廣泛的討論。

臺灣過去五十餘年以外貿導向為主的經濟發展策略，使得臺灣累積一定的國際經驗，也培養出許多優秀的人才，同時是世界第 14 大貿易國，但因為臺灣資源有限，科技和技術水準不高，又面對與大陸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因此近十年來，經濟發展一直無法繼續突破，介於中心國家和邊陲國家之間，因此全球化對臺灣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害參半。臺灣是一個以外貿為主的國家，在全球化的環境中，可以隨著全球自由貿易的推動，扮演更重要的重角色。例如臺灣加入 WTO 後，就已經與其他 143 個會員國進行對等的經貿活動，並在國際貿易中，享有更公平合理的待遇，獲得國際法的保障。此外，臺灣也可以藉由其他國際經貿活動的參與，加強外交關係，並協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提高國際影響力（林炳中，2002：64-70）。

其次，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國際分工越來越明顯，尤其在加入 WTO 後，臺灣進一步融入全球市場，意即臺灣也進一步成為全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在完全

¹² “China As The Center Of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hina Brief*, Volume 4 Issue 15 (July 22, 2004)

競爭的市場環境下，臺灣必須清楚比較自己與別人的競爭差異，尋找產業發展的利基，將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調整產業結構，以便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找到最適合的位置，維持競爭力（黃鎮台，2002：1-9）。此外，臺灣地理位置適中，位於東北、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之間，緊臨大陸 13 餘億人口市場，西銜北美市場，南接東南亞諸國，經新加坡轉運更可連接南亞和歐洲市場，地理環境具有國際競爭優勢。

但兩岸的經濟合作還是無法擺脫政治因素的限制，除非有重大突破，否則經濟整合仍只是個幻影；諷刺的是，兩岸當局均有推動自由貿易區的構想與動作，卻寧可與其他國家合作，而排斥兩岸的整合。中共積極與周邊國家洽簽 FTA，同時圍堵台灣對外洽簽 FTA，對台灣生存空間的擴展已造成影響。FTA 的洽簽過程需要政府之間的實質政治互動，這使得外交處境困難的台灣，更容易遭到「惡意」排擠（例如中國因素）而導致「缺席」。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吳榮義就曾指出，區域主義對台灣未必不利，但區域主義結合中國因素則肯定對台灣有害（洪讀，2004）；是故，如何改善兩岸關係，消除政治敵意，成為兩岸是否能夠推動經濟整合和經貿全面往來最重要的關鍵。因此，政府積極推動和中國大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三個主要目的，即在（一）、要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目前雖然兩岸都是 WTO 的成員，但是彼此之間的經貿往來仍有許多限制。（二）、要避免我國在區域經濟整合體系中被「邊緣化」，區域經濟整合是全球的重要趨勢，目前全世界有將近 247 個自由貿易協定，簽約成員彼此互免關稅，如果不能和主要貿易對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我國將面臨被邊緣化的威脅，在重要市場失去競爭力。而中國大陸是目前我國最主要的出口地區，與中國大陸簽署協議並有助我國與他國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可避免我被邊緣化。（三）、要促進我國經貿投資「國際化」。陸續與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簽署協議或協定，可助台灣融入全球經貿體系，並吸引跨國企業利用我國作為進入東亞的經貿投資平台。¹³

面對上述問題，企業應該積極培養全球眼光，使其本身具備能夠應付全球競爭所需的組織架構及素質，所生產的產品或提供服務也必須符合國際水準，企業應重視全球學習與組織知識的流動，重新改造工作流程，以國際化競爭為重點。企業在經營上亦應擁有國際化的佈局以及行動的能力，針對全球不同資源，進行不同配置，以期作出最有效益的整合和利用，創造最大的利潤，另創新能力是全球化趨勢下的一項重要的競爭力來源，目前臺灣經濟以仿似製造業為主，生產技術的創新對臺灣而言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臺灣教育水準普及而且程度高，社會

¹³ 「ECFA 介紹」，<http://www.ecfa.org.tw/intro.php>

多元開放也為臺灣的創新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礎。但長久以來臺灣企業缺乏技術研發投入不足，阻礙產業升級的速度，也對國際競爭造成負面的影響，未來政府應積極鼓勵企業投入研發，在技術和科技上不斷突破，如此才能維繫臺灣的全球競爭力。

五、結 論

全球化已經成為全世界發展主流，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置身於外。中共經濟目前還在發展中階段，雖然具備雄厚的市場潛力，同時也是全球這幾年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之一，但在全球化架構下，中共仍然會受到全球化的衝擊，其經濟發展必然會受到全球化的影響。面臨全球化潮流的衝擊，最令中共官方擔心的事情是，惟恐經濟自由化的高漲會引發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以致逐漸發展出一種對全球化既期待又害怕的複雜心態，蓋因全球化既是中共邁向強國之路的絕佳機會，但也是維繫大陸內部穩定發展的最大挑戰。然而，隨著資訊的快速傳播，總會使中共當局擔心其控制社會的能力勢將大幅度降低，各種外來思潮勢將更容易進入社會內部，進而可能動搖其統治基礎；這是一體的兩面，在面對區域經濟整合及全球化迅速發展下，是中共要持續發展經濟，及持續掌握政權所必須面對的大問題。

在台灣方面，面對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潮流，台灣亦應從國際競爭和全球產業佈局的角度，思考如何因應潮流，追求經濟的發展。兩岸經濟目前均面臨嚴峻的挑戰，如何將此一挑戰轉變為發展的契機，提昇兩岸的國際競爭力，有賴於兩岸政府以務實、理性的態度，推動雙邊經濟整合；希望雙方若能排除政治障礙，加速增進經貿往來，發展互補互利合作關係，如此定能開創共存共榮的局面。尤其是有關「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實際內容，兩岸在第四次「江陳會議」中有機會進行業務溝通時候會慢慢成形。誠如馬英九總統指出，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好比兩岸合寫一本書，我方先把書名定下來，如果大陸願意就用這個名稱。接下來，序言部分絕不會出現「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和平統一」這些內容，純粹與兩岸先前簽署完成的九個協議一樣，屬於純經濟。再來是目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諸多內容中，我方有幾個項目會先達成，目的是先處理迫切問題（PCHome新聞，2009）。若能依此方式，加強國內的政治溝通化解內部爭議，就利益與衝突做好評估與妥善的因應措施，而能在全球化的挑戰下，運用區域經濟整合的優勢，而謀求台灣的經濟穩定與發展。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 王佳煌，1998，《國家發展》，台北：臺灣書店。
- 朱景鵬，1999，〈區域主義-區域整合與兩岸整合問題之探討〉，《中共研究》，42(8):12-14。
- 何振生，2001，〈全球化之國際事務主要特徵〉，《臺灣經濟研究月刊》，24(6):43-48。
- 吳榮義，2004，〈東亞共同體之倡議與展望—兼談台灣因應之道〉，「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九十二年度國際事務檢討會」。
- 宋國誠，2002，〈全球化與中國-機遇、挑戰與調適〉，《中共研究》，45(2):1-25。
- 宋鎮照，2001，〈台灣對於東亞經濟圈構想之期待及自我定位〉，《國政研究報告》台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李英明，2001，《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和兩岸關係》，台北：生智出版社。
- 沈宗瑞等譯，2001，《全球化大轉變：對政治經濟及文化的衝擊版》，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 林炳中，2002，〈WTO、全球化與兩岸經貿競合〉，《臺灣經濟研究月刊》，25(1):64-70。
- 林炳文，1996，〈兩岸三地經濟回顧與展望一下〉，《信用合作》，47:39-45。
- 洪讀，2004，〈東協為核心的區域經濟整合及對我國的衝擊〉，《國家政策論壇》。
- 徐偉傑譯，2000，《全球化(Globalization)》，台北：弘智文化。
- 馬立誠、凌志軍著，1998，《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 張維邦，1995，〈國際經濟整合的概念與界說，兼評中華經濟圈、華年經濟圈的提法〉，《法政學報》，4:61-75。
- 黃鎮台，2002，《全球化下台灣經濟發展的新思維》，台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楊雪冬等譯，2001，《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詹滿容，2003，〈東亞共同體〉，「外交部諮詢委員會議：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第七十二次國際現勢新聞研析座談會」。
- 鄭竹園，1991，〈台灣海峽兩岸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政治評論》，58:8-9。
- 鄭竹園，1994，《海峽兩岸經濟發展與互動》，台北：聯經出版。

- 鄧嘉玲譯，1998，《杜拉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台北：天下文化出版。
- 〈亞洲政策論壇〉，《經濟日報》，2002年10月2日，第4版。
- 〈中國農業部：入世後中國農民面臨嚴重危機〉，《中國時報》，2002年2月28日。
- 《亞洲華爾街日報》，2003年10月12-13日。
- 〈中共睦鄰外交下的經濟擴張〉，《聯合報》，2002年11月5日。
- 〈馬英九：簽訂ECFA 好比兩岸合寫一本書 明年上半年可望有望完成〉，《PCHome新聞》，2009年8月17日，第4版。
- <http://news4.pchome.com.tw/politics/cnyes/20090817/index-12504786421345909001.html>

二、英文部分

- Chen, Suxun and Charles Wolf, Jr. ed. 2001.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Santa Monica, CA: RAND.
- Overholt, William H. 2004. "China's Economy, Resilience and Challenge." *Harvard China Review* Spring: 48.

（投稿日期：98年9月1日；採用日期：98年10月16日）